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4)

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4)

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8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4)

ISBN 978-7-5325-5370-9

I. 新... II. ①复... ②复... III. 中国—近代史—研究 IV. 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9379 号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4

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29 插页 5 字数 366,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5370-9

K·1218 定价: 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4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立诚 朱荫贵 吴景平 张济顺 张晖明

陈思和 林尚立 金光耀 金冲及 姜义华

顾云深 章 清 熊月之 戴鞍钢

执行编辑:张仲民 乐 敏

责任编辑:郭子建

编者的话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席卷欧美史学界。区别于那些精英式的文化史研究,新文化史之所以为“新”:首先在于其理论资源上,它吸收了后现代主义、语言学、人类学、文学、文化研究理论的成果,放弃对宏大叙述和客观规律的追求,亦不把历史研究之目的看作是为了获致历史之终极真相,转向强调意义的阐释,重视文化的建构力,认为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能优先于或决定文化因素,它们本身就是处于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中的。其次,新文化史这种“新”又明显地体现在其研究典范与研究主题上,一些诸如气味、想象、死亡、空间、梦、垃圾、屎、疼痛、疾病、姿态、眼泪、同性恋、手淫、食物、盐、煤、火、镜子、乳房、头发、内衣、厕所、戒指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关注对象与研究内容;至于一些诸如政治、经济类的老命题在新视野、新方法之下也被重新检视,重新研究。正如伯克(Peter Burke)所言:“我们正在通往任何事物都有其文化史之途,梦、食物、感情、旅行、记忆、姿势、幽默、考试,诸如此类。”目前看来,新文化史已经大大改变了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实践以及人们关于历史的思维方式,在此情况下,文化史几乎成为新文化史的简称,大有“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之势。

简言之,新文化史虽然大大开拓了史家的视野,发现了如此之多的新研究主题,但对于这些研究主题来说,传统的材料是不够

的,相对新的材料——从文字到图像到实物,其运用都要被提上日程,当然这也需要史家在使用这些材料时慎重考辨。另一方面,如果有新的眼光和研究方法,即使是使用旧材料,也能发现过去史家所不能察觉的新意,对老问题产生新认识。故此,不管新文化史如何地强调理论与方法,落实到实践层面,新文化史还是要建基于史料之上。从根本上言,新文化史还是历史,占有大量材料,对之进行缜密细致的解读,上下左右、参照比对,依然也是新文化史家最基本的工作。没有坚实的史料基础,新文化史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新文化史的诸多经典著作之所以经典,首要一点仍然在于其尽可能地广泛收集和使用材料,其次才是他们解读材料的眼光和在研究中所遵从的典范。

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新文化史研究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成为一场国际性的史学运动,迄今依然表现着其蓬勃的生命力——一批又一批新文化史著述不时推出,日益扩大的读者群就是证明。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分析等学术潮流很少影响到西方的汉学研究,新文化史在这一时期虽然席卷欧美史学界,可其对中国研究却几无影响,只在中国大众文化与近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些反响,且这些反响更多是与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纠缠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之威力开始广泛影响于西方汉学界。就国外研究中国问题实力最强的美国汉学界而言,在一些关于民族及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上,新文化史范式表现得最明显;另外一个该范式体现最显著的研究领域,是在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中,这种情况同妇女史研究中含有的对抗宰制者、“拯救历史”的性质有关。另外,在西方史学界,印刷文化史、城市文化史已经成为新文化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学术增长点,这种现象同样出现

在近年来欧美中国学界的研究实践中。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受西方印刷文化史研究的影响,中国书籍史、报刊史以及相关的出版史、印刷史、阅读史研究在欧美汉学界一直非常流行,他们尤其关注晚明清初、清末民初的书籍史、出版史。而欧美中国学界的城市史研究一直是其传统关注点,不过其研究重点不再只限于以前城市的政治、经济层面,目前更多的则是聚焦于中国城市的现代性、文化、生活与消费等层面。其他学者关于法律文化史、近代中国消费文化史、物质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大众文化史、政治文化史、医疗史、身体史的研究和理论探讨,以及别的一些学者对于近代中国博物馆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认同和记忆问题的研究,对于近代疾病、医疗、社会福利、毒品、自杀等问题的研究。诸如此类,在在显示出西方中国学界特别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新文化史取向。

新文化史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被引入台湾,最初的鼓吹者主要为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的卢建荣,台北麦田出版社在其主持下曾推出几批西方新文化史经典译著,在岛内引起很大回响。随后,提倡者与实践者日多。近些年来,从物质文化史、商业文化史、旅行史、家庭史、消费史、表象史到身体史、医疗史、阅读史、大众文化、宗教文化、性别研究、记忆研究各个领域,台湾学者都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新文化史研究在台湾史学界也渐居主流。

在中国大陆,明确的“新文化史”的出现大约在 1999 年,由于新文化史家伯克访华时的鼓吹,“世界史学界”渐有一些相关的介绍文章和翻译文章。约莫同时或稍早,大批的新文化史译著也开始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与伯克访华并无直接关系),特别是法国学者的新文化史著作大量被翻译出版。近十年以来,诸多出版社都大量出版了这类新文化史作品的译作。不过,这些新文化史的

译介者多是从事文学、西方历史或史学理论的研究者,鲜见有人将之融入自己的实证历史研究中,以新文化史实践者自居的大陆学者并不多见。

有意思的是,不管在台湾或是在大陆历史学界,新文化史某种程度上都出现了与社会史和平共处甚至是合流的现象,这自然与两岸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革命叙述及“政治史学”独大的形势有关,使得颇颇政治史独大地位的社会史、新文化史有着共同的“敌人”,而非互相掣肘、不共戴天。同时,海峡两岸的社会史研究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有强烈的理论预设和“尾大不掉”的发展;同作为舶来品,新文化史研究者并不感到社会史势力的庞大,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甚至是从社会史的研究中延伸出来的。相比较起来,大陆的新文化史研究多少还笼罩在社会史或新社会史的阴影之下,这种偏爱社会史的情况,可能与大陆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对新文化史所知不多有关,更可能与长期以来在大陆流行的现代化迷思有关——目前以现代化(或近代化)作为典范或指南来研究社会史,在大陆依然非常多见。实际上,个别大陆学者已经在医疗史、卫生史、身体史等领域有一些实践;在与新文化史密切联系的日常生活史、历史人类学与微观史学的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研究成果常常被研究者及论者归为社会史或新社会史(有时是思想文化史),即或某些研究成果在实际上更应该属于新文化史范畴。不过,这两年来,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也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友声”,一些研究论文与专书不时涌现,相关的学位论文选题也不少见,本专号之编辑或者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收入本专号的文章包括五篇专题论文,六篇研究讨论及三篇书评。它们虽不能完全涵盖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围与研究典范,但亦可作为读者认识新文化史提供一些助力。其中,潘光哲和季家珍的文章属于新文化史领域中所谓的“表象史”研究,关注的是近

代中国人对“地理”、对“女英雄”、“女战士”形象的想象与建构,以及这种想象和建构的意义与局限,乃至其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章斯睿、侯艳兴、张笑川三文则属于消费文化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目光都聚焦于近代上海的日常生活空间,探讨了消费与政治、身份认同、空间与政治、日常生活的关系。六篇的研究讨论,或是从文化的角度,或是在新文化史的脉络里,对中国当前国际政治学、阅读史、物质文化和消费文化史、身体史、图像研究、城市文化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为读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资讯,并对之进行反思、总结和批评,各自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和展望。这六篇研究讨论,尽管个别文章略显幼稚,前三文亦稍稍逾越传统的“近代”之界,但对于读者认识新文化史研究的典范与实践,相信还是非常有益的。两篇研究性书评,评述了近些年西方汉学界研究近代中国消费文化史与政治文化史的两篇力作,第三篇书评是针对英国著名文化史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的信仰文化研究,所进行的一篇介绍与评鉴,此文对于中国宗教文化、信仰文化的研究者了解与借鉴基思·托马斯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也应该有提示性的作用。

需要提醒的是,在现在的西方,新文化史研究虽然是一个很成熟的研究领域和历史学典范,但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对之进行批判与反思。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任何的学术典范都不会毫无争议,所有的学术研究方法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和争议正是我们重新思考和创新的出发点,而不是我们用来墨守的成规。无论未来的历史研究如何走向,都将不会回归到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和宏大叙述的旧途;无论未来的历史研究典范为何,都不会毫无争议和问题。

较之于西方的情况,在中国大陆,新文化史还不存在像西方那样的弊端,比如新文化史研究为人诟病最多的历史碎化问题——

对越来越小的事物知道得越来越多,在中国大陆就恰恰相反——我们历史研究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微观研究太少、宏大叙述太多。可以说,就眼下而论,新文化史仅仅是刚从“妾身未明”的地位中走出来,远远谈不上成熟,大陆学者的新文化史实践,也远远落后于海峡对岸和海外的同行。一言以蔽之,如何把新文化史典范更好结合中国历史情况进行研究,仍是有待具有新思维的中国大陆历史学工作者的集体努力,编者期望他们知耻后勇、披荆斩棘,“形成自己的主体性”、“提出一些别人不得不听的议题”(王汎森语),开创出中国新文化史研究的繁盛局面。如卢建荣之言:“等到有一天中国史家运用新文化史的研究典范写出扣人心弦的史作,同时也令西方同行侧目之时,中国史学主体性才告确立。这才会终结做经人二手传播的西方学术附庸的悲运。”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

· 专题论文 ·

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 (1895—1925)·····	潘光哲 1
扩充女性/国族的想象:晚清妇女期刊中的社会女 英雄及女战士·····	季家珍 著 曹南屏 译 54
从情调消费到大众消费 ——1949年前后上海咖啡馆的命运 ·····	章斯睿 79
旅馆故事:民国时期的上海旅馆·····	侯艳兴 103
煤油灯下的世界 ——1937年前上海闸北城区的日常生活 ·····	张笑川 147

· 研究讨论 ·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化:中国的冲击 ·····	阿里夫·德里克 著 潘 星 刘宗灵 译 186
阅读史的课题与观点:实践、过程、效应·····	李仁渊 213

植物、医学知识与消费文化:前近代东亚的人参史

研究的新取向 蒋竹山 255

身体之史:历史的再认识

——近年来国内外身体史研究综述 刘宗灵 287

图像的“文化转向”

——新文化史视域中的图像研究 曹南屏 323

从文化视角解读城市

——对近年来中国城市文化史研究状况的考察
..... 闫 鸣 362

· 书 评 ·

对战时中国合作行为的另类叙述

——读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王春英 385

消费文化: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新取向

——读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皇甫秋实 395

基思·托马斯和《宗教与魔法的衰落》 陆启宏 405

· 史料辑佚 ·

章太炎的两封佚信 张会超 429

清末报刊上改良小说和戏曲论述篇目(1900—1911)

..... 张仲民 442

《远生遗著》补遗 王红军 453

印光法师佚文目录 释慧明 471

· 附 录 ·

与本辑主题相关的论著目录(英语部分) 曹南屏 480

与本辑主题相关的论著目录(日语部分) 蒋竹山 506

· 专题论文 ·

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 “地理想象”(1895—1925)

潘光哲

摘要:本文以张灏教授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1895年至1925年)的宏观论说为纲目,讨论“地理想象”如何成为统摄人们理解/解释世界,开展论述的“默会之知”,彼此同润共享。尤其是“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勃兴,促使人们得与世界思想潮流同波共舞,既展现了中国和世界未可或分的共同认识,也导引人们对中国国族在世界秩序里的地位,重行绘制一张簇新的“认知地图”。亦且,在这个“转型时代”展现的“地理想象”样态,更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徘徊踟躇,莫衷一是。可以说,“地理想象”创造了真实和想象杂揉兼存的“第三空间”,既真又假,绵延相续,曾无已时。

关键词:转型时代,地理想象,普遍主义,特殊主义

潘光哲: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夏敬渠的《野叟曝言》^①是清代著名的“才学小说”之一，是他个人才情的具体彰显。在夏敬渠汪洋恣肆的想象里，非仅主角文素臣自己功业崇隆，他的友朋也是际遇不凡。像文素臣的好友之一景日京便“领兵航海”西行，“征伏欧罗巴洲二十余国，建国号曰大人文国”，还让“意大利、亚波而、都瓦尔、依西把尼亚，各率附属小国，降伏大人文国主，受其节制。俱秉天朝正朔，亦如中国之制，除灭佛老，独宗孔圣。颁下衣冠礼制，用夏变夷”^②。待得进入 20 世纪，市面上则出现了陆士谔的^③《新野叟曝言》（1909 年初版），“故事新编”述说文素臣的子裔文弼，作为多才多艺的发明家，发明了可以远征到金星、木星的“飞舰”之后，奉了皇上圣旨，先“牛刀小试”一番，担任征欧大元帅，出征欧洲，振翩西行，不过一昼夜就到了欧洲，瞬即横扫无敌，让全欧洲七十二国投降恐后。随后，文弼更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征服了月球和木星，不仅中国的黄龙国旗飘扬在月球上，木星更成了中国的殖民地^④。夏敬渠和陆士谔的小说家言，好似荒诞不经，那种将自己步履从来未可及之的遥远异域，纳为己身臣属之土的意欲，却是跃然纸上。固然，夏敬渠和陆士谔身处时代之差异，他们吹鸣的两阙狂想曲所展现的思想涵义，亦不可等量齐观；却可想见，当小说家在无限宽广的想象空间里自由驰骋的时候，还是自有其知识凭借，特别是既存的地理学知识，正是他们在这方空间里熔铸真假逞其幻思文采的思想动力根源。

考究这股推动夏敬渠和陆士谔挥洒巧想幻思的知识/思想潮流，自然和“西潮东渐”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自 17 世纪以降，耶稣会教士带来的（由西方建构的“现代”）地理知识，已曾引发相当的

知识震撼/争辩^⑤。在18世纪大清帝国对外扩张的历程里,来自西方的地理知识即为帝国扩张之所需,如康熙与乾隆年间分别竣工的《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舆图》,便是传教士的功劳^⑥。在帝国扩张的历程里,以各式各样的地理文字数据/图像视觉表述来界定其子民与领土范围的成果(如《皇舆全览图》或是《蛮獠图说》和各种“采风图”等),也纷纷问世^⑦。各种官修《方略》^⑧,陆续纂修,也是炫耀帝国武功之盛的表现,即可视为“地理帝国主义论述”(geo-imperialist discourse)之张本^⑨;流风所及,19世纪上半叶各式关于现今中国边疆事务的大量私家著述问世,固可视为考据学风与经世思想的结合反映^⑩,更是展现帝国荣光的历史书写^⑪。约略与此同时,伴随着基督教传教士重启传播“福音”的浪潮,各式各样的地理知识与信息,也铺天盖地与之来袭^⑫。大约在1830、1840年代的时段,中国士人自己也开始(以传教士提供的信息为取材来源之一)纂辑述说世界地理和局势的作品,如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年初度出版,此后更陆续增补的)^⑬与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初刻于1848年)^⑭,就是个中“名著”。各式各样的相关地理文本,源源不绝,同时并存,千奇百怪的大千世界与不可思议的知识,迎面扑来。由于地理知识的成长和变迁而引发的知识/思想效果,涟漪外漫,波纹荡漾,既对源远流长的“知识世界”的内部结构提出了挑战^⑮;那些外在于中国的世界/国家,也成为知识的对象(an object of knowledge)^⑯,各式各样的探索述说,络绎而生。可以说,随着地理知识的更易增减而引发触生的“地理想象”^⑰,让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世界,得到了无限宽广的嬗变空间。

然而,在1895年以前的岁月里,具体反映人们的“地理想象”的认知述说,固是丰富多样,那些可以具体表现人们的“地理想象”的物质基础,基本上还是局限在传统的范畴里,王锡祺纂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可称集其大成^⑱,犹为书本形式,即为一

例^①。相形之下,正如张灏教授的宏观论说,从1895年至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可名之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那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领域方面,也展现了突破性的巨变,报刊杂志作为“制度性传播媒介”的表现之一,不仅报道国内外的新闻,并具介绍新思想及刺激政治社会意识的作用,影响深远^②。在这个“转型时代”,大量出现的报刊杂志则正是生产/表现“地理想象”的最主要载体,非仅确证与转化既存的地理知识,更将中国与世界联结起来,从而提供源源不绝的认知想象动力。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务,和中国之关联所及,意义所在,都以地理空间的认知作为人们共享同润而又不证自明的默会之知(tacit knowledge),进而将彼此联系起来,交换讯息/意见/知识,乃至各持己见,争论驳辩。特别是在现代高度发展的新闻交换体系之下,“天涯若比邻”,足可震惊一时的大事,迅即为人们共知同晓,也就是说,在现代新闻传播的过程里,总会展现出“把国外的事务国内化”(domesticating the foreign)的面向。当然,在这个“国内化”的过程之中,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国内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的编码,以自己的观念/语汇来解读/认识那些形形色色的外国新闻^③;同样的,人们透过这些“制度性传播媒介”而展现/表达的“地理想象”,往往也可能是真实和想象杂揉并括的“第三空间”^④,错综复杂。总言之,在中国近代“转型时代”呈现的“地理想象”,实是五彩斑斓,引发诱生的历史结果,更是多样繁富。

二

在中国近代的“转型时代”里,“制度性传播媒介”作为生产/表现“地理想象”的最主要载体,其具体的生产流通过程的物质条